

双周学术

《尚书》的民本思想与当代价值

张连起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尚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一民本思想的经典表述。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引用《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格言。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意蕴深远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民本思想肇始于夏商周时期。《尚书·五子之歌》记载:大禹的孙子太康无道,被有穷、后羿弑起来废了。太康的五个弟弟作《五子之歌》述大禹之训诫:“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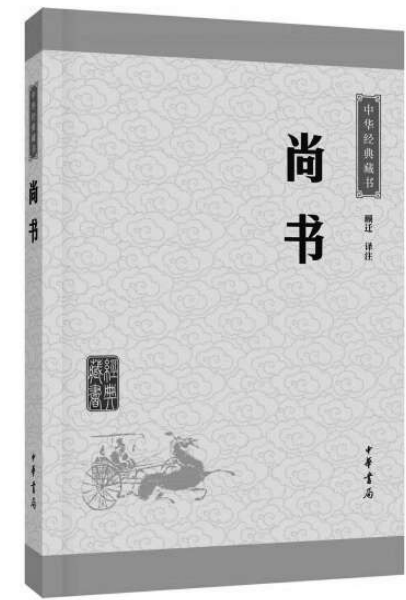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大禹不仅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且也在治国中践行民本思想。周公总结商亡的教训,主张“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民本思想为指导实施德治。《尚书·康诰》的许多记载表明,周公深知殷商之鉴,努力安民保民、实施德政。

一、《尚书》中的民本思想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极其丰富,其源头就是《尚书》。如: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时变雍。“克明俊德”指能够发扬大德。“以亲九族”,“九族”指家族,就是说使家族亲密和睦,做到齐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孔颖达解释为百官族姓,家庭已经和睦,就辨明百族的政治事,做到治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时变雍”。“于”,用作连词,“因此”义;“善”,友善;“雍”,和雍。百族的政治辨明了,又能使诸侯国协调和睦,老百姓因此变得友好和睦,达到了平天下。

记载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语的《尚书·泰誓》篇,就是武王伐纣时发布的誓约。虽然周武王原为商朝臣属,但2000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把他看作犯上作乱的罪人,而是把他看作救民于水火的贤圣之君。武王伐纣被称为顺天意、应民心的丰功伟绩,《泰誓》甚至认为此举“于汤有光”,即周武王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从根本上讲,他发扬了商汤的精神,继承了商汤的事业。

“敬天爱人,德政保民”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周王朝建立后,总结桀纣失国的教训,迅速确立了民本德政的思想和国策。他们认为,上天可以在统治者有德的情况下给予天命,也可以在失德的情况撤回天命,转给别的有德者。统治者必须谨慎地认识和理解天命,并通过礼乐来发扬和实施让周获得天命的“德”,也就是“以德配天”。他们又认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即上天并不直接向人说话,而是借着人民来表达意思和施行选择。于是,这种德性政治最后的落脚点,自然而然地由“敬天”转到了“爱人”,由“以德配天”过渡到“保民而王”。也就是说,周朝民本德政的核心在于,通过让人民安居乐业来彰显他们所具有的“德”



性”,并在“天命”之下,通过实施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措施,完成代天理民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从而通过民安保证国泰。由此,这种德性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厚利民生。

《尚书·洪范》中的民本思想,即所谓“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是也。周朝的“敬德保民”思想以及通过建立礼乐文明而形成的政治伦理思想充实了《洪范》中民本思想的内容,使之建立了以道德为本位的政治伦理体系,并在以后历代帝王治理国家中被广泛应用且不断发展,最终成为系统化、理性化、科学化的统治大法。

春秋时代,邦国林立,见于史书记载的就有100多个,由于周平王自东迁后地位一落千丈,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之间纷争不断,战争极其频繁。民众决定国家兴亡。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历史和现实的斗争中统治者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于是民众决定一切的思想便得以产生。夏商周三个朝代在历史舞台上相继更替,周朝统治者认识到周朝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并非因为周朝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比商朝更强大,而是民心归向和人民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爱民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尚书》中给出的答案十分明确。“安民则兴,黎民怀之”;“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说明爱民就能得民心,君民关系融洽,缓和社会矛盾。

二、《尚书》的当代价值

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主张功利强权。《尚书》留给我们六点思考:

第一,崇尚天命,顺应民意
上古时代,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于是,人的精神世界笼罩在天命之中。崇尚天命,在《尚书》的许多篇章中都有详细记述。后来天命论成了统治者执掌权杖的武器。但天命为什么会变?上天在什么情况下会把权力收走呢?“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上天爱怜民众,只要民众有要求,上天就会将权力收走,转移给最合适的人。

艺文从谈

水乡情怀,直抒性灵

——试论沪上水乡女诗人枫肥诗歌的艺术特征

崔丽娟

思考写作旅游,在岁月的流逝中,她笔下的一切,自然而然交织出极具审美价值的精神空间和颇具情志意蕴的立体化剖面。她的诗,在诗意之外,值得回味。

诗必须有独特的具体的细节,否则就会浮在词语的表面。诗人枫肥用工匠精神精雕词语,磨炼意境,让每个字都获得尊严,让每个词都显现价值。她的诗注重细节的描写,诗歌意象丰盈,起承转合间把日常生活赋予她的灵感和体悟精准而妥帖地传达给我们。可以说,枫肥对文字的判断力一方面得益于她对文学的鉴赏力,另一方面则源于她敏锐的洞察力。她的《独行》《悟》《网》《一直在路上》《雪迹》等都是我喜欢的佳作。正如上海社科院诗歌评论家孙琴安教授评价:枫肥的诗歌充盈着浓烈的水乡情怀,简洁、干净、朴实。

境界往往作为衡量审美价值和艺术水平的标准而存在,它也是衡量审美对象规定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枫肥是一位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诗人,她以自己走过的时光中抒写美好的情感,创造生活的诗意。很多诗人都写过爱情诗,女诗人尤其。枫

上天转移权力的意识从何而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上天和百姓的心是相通的,天命来自民心。要想保有天命,必须获得民心。

第二,施德政,任贤能
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是我国上古时期最重大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深化了当时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对治国理政的认识。“德惟治,否德乱。”“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到了周代,召公更直接指出,夏商两代都是由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并以此告诫年幼的成王。

此外,选用什么样的人,也事关为政的成败。“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官不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强调的都是为政之道,首在用人;用人之道,当用贤能。

第三,关注民生,安定社会
先哲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国家的根基在于民众。民众安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权才会稳固。

《洪范》是较完整地提出社会治理原则方略的一篇文章,它把五行列为施政要做的九件大事之首。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保障民众生产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物质,这些物质丰富了,民众生活就安定了,政权也就稳固了。该文还把民生问题的内容具体化为“八政”,即施政要做好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八项政务,关心民众的吃饭、生财、祭祀以及救助、教育、治安等问题。这些论述闪烁着古代先哲们的思想光辉。

第四,提倡勤勉政务,反对安于逸乐
先哲深知维持一个政权的长期存在并非易事,因为“皇天无亲”“民心无常”,只有勤于政务,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如果“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国家就会灭亡。怀有责任意识,才能克服惰懒逸乐的思想。君主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就会振奋精神,勤于政务,自觉约束逸乐。

第五,依法治国,谨慎施刑
上古时期,由于财富的私有化,出现了寇贼等现象,于是产生了法律,用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早在舜舜时期,就设置了专管司法的官员,制定了“五刑”,并将其图像刻在器物上以警示人们。还规定用刑要做到明察案情,量刑公允。

《吕刑》是《尚书》中唯一一篇讲述如何依法治国、慎于用刑的文献。“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要听取原告、被告双方的讼词,不能只听一面之词。“简孚有众”“无僭乱辞”,要从第三方了解案情,不能听信虚假供词。“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定案要以法律条文为依据,反复思考,做到公正,令人信服。虽时隔几千年,《吕刑》中提到的这些原则,对今天司法执法守法仍然值得借鉴。

第六,强化危机意识,加强学习修身
从多次的权力更迭中,先哲们认识到统治者是否具有居安思危意识对巩固政权非常重要。怀有忧患意识,就不会陷入困境;缺少这种意识,安于逸乐,怠政荒政,就一定会陷入困境。

作为华夏儿女,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答案也许就藏在包括《尚书》在内的世代相传的典籍里。

三、民本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民为邦本,顺应天道就是顺应民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世界观、社会历史观由“神本位”向“人本位”过渡,由皇权天命论转向民意天命论。其次,君主敬德、爱民可以实现天命的转移。最后,敬民、爱民的道德情怀通过安民、利民的民生实践表现出来。《尚书》提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观点,书中记载了大量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三代执政者重视农业生产,通过设官督农、制历授时、兴修水利等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安民、养民的丰功伟绩。

《尚书》中丰富的民本思想资源为后世儒家继承发展,民本成为儒家政治思想核心理念。孔子系统地阐述了“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孟子力诫君主“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至汉代董仲舒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后,越来越多的君主笃信、笃行民本思想,对民众抱有敬畏之心,将“民为国本”“仁政爱民”的圣哲古训视为江山永保的圭臬。

我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拥有一个不变的民本结构,那就是以天为则,以史为鉴,以民为心,正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星光熠熠、辉煌灿烂,然而回望其在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却寥若晨星,暗淡无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体制无法为民本思想的实践提供可能的条件,只能成为思想家们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景,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只有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人民民主制度成为承载民本思想的现实接口。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了古之圣贤难以企及的政治理想。

新时代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和发展了民本思想的精华,赋予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高度自觉,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政治担当,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始终坚持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人的情怀和执政理念。抗击新冠疫情斗争中的每一个具体举措和生动事例,清晰展现出一幅坚持人民至上的壮美画卷;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铸就“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下的中国奇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指明新发展理念的目标方向,凸显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治国理政的根本价值。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汲取和创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肥沃土壤。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前进,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相融相通中迸发出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

家训品鉴 ②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作为政治家,他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作为思想家,他开启民智;作为文学家,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黄遵宪语);作为史学家,他被誉为中国“新史学的奠基者”;作为教育家,其学生遍布天下,如蔡锷、徐志摩、蒋百里等,其九个儿女个个德才兼备,人人爱国向上,成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才。

从1910年代到1930年代,梁启超把子女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送往国外学习,这期间与他们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写了400余封家书。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既是父亲的助手,又是弟妹们的领袖,她去加拿大后,成为弟妹们联系的核心,因此梁启超的信多先寄到思成处再由其他子女传阅。从《梁启超家书》中的话语,我们可以窥见梁启超的教子经验。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27年2月6日,梁启超给孩子的信中写道,“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们平生最佩服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作甚?着急它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满,一面又不可怯弱自卑,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物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在这封信中,梁启超用曾国藩“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名言教育孩子,意在说明,我们做事,不能只想着回报、酬劳,更要想着把事情做好,耕耘好自己的一片天地,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要与子女做朋友。“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亮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梁启超在给儿女的信中,常常称呼他们为“宝贝”“baby”,他教育孩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与孩子做朋友。梁启超给儿女们的信比孩子给他的信多很多,作为父亲,亲自给孩子们写信,与他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每一件事都娓娓道来,很值得我们今天的家长学习借鉴。

做人要有几分“孩子气”。1925年7月10日在《致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我说你‘别耍孩子气’,这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耍孩子气’呢。”梁启超说有孩子孩子气,一种是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另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童心童趣。

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交替循环。梁启超告诫孩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去用。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实而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火炖的功夫。”猛火熬和慢火炖,就是要我们处理好学习知识和消化知识的关系。

尽责尽力,就是第一等人物。“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的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梁启超教育孩子,尽责尽力就是第一等人物,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非常高的要求。很多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干大事、创大业,其实人首先要做的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一个不懂得承担责任的人,即便做成大事,也会很快失败。

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在1928年5月13日《致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她本勉强进大学。你们兄妹各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放心了。”当时女儿梁思庄刚到国外学习,一时无法适应,梁启超在信中写道:“至于未能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可见梁启超关注的是孩子的基础是否牢固,而所谓的成绩和分数,不过是表面的东西。

通达健康的人生观,是保持乐观的要诀。“我有极通达、极健康、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梁启超认为,给孩子树立通达、强健的人生观,比教育他们学具体的知识更为重要。这种通达、强健的人生观让孩子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帮助他们战胜困难。

在家书中,梁启超对子女们读书、写字、学习课程,选择学校、选择专业、选择职业等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但不强迫命令。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亲切的导师、知心的朋友。孩子们也向他坦诚地诉说学习和思想上的困惑,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梁启超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

梁启超特别关注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修养,希望自己的子女都具有“不惑”“不惧”“不惧”的君子德行,养成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习惯,无论遇到何事都能有睿智的判断、坚定的信念和勇敢不惧的精神。梁启超注重把自己的爱国情怀传给子女们,在家书中,他常教育孩子们要把个人努力和对社会的贡献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报效祖国。梁氏9个子女7个留学海外,皆学有所成,无一例外都回到祖国,体现了爱国家风的良好传承。

在家书中,没有疾言厉色的训斥,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更没有顽固不化的面孔,反而处处渗透着炽热的情感,亲切的称呼、细致的关怀、深情的思念、真诚的告白、娓娓的诉说、谆谆的教诲,无不流露出梁启超深深的爱。

显然,梁启超是个开明的父亲,也是一个高明的教育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风与家教,都往往是从小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写给子女们的每一封信,都传递着他的体温,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和暖意,种种人生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地影响着孩子。观其一生,他就像一个辛勤的园丁,耕耘劳作,心血浇灌,最终结出了丰硕果实。清华研究院的高才生谢国桢曾在梁家任教,他对梁氏的家风家教羡慕到了极点,常和同学们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无论如何,梁启超的为父之道和家家教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效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梁启超家书》：家国情怀 贡献社会

王杰

(作者系上海市文史馆《世纪》杂志副主编)